

從個性解放到服從組織 ——中共早期革命青年的情感研究

● 許 良

摘要：五四時期，進步青年在轉向共產革命過程中所呈現出的情感變化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文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即情感體驗、情感能量以及情感交往。情感體驗是指，當五四時期的「個性解放」逐漸被以強調集體性和紀律性見長的革命文化替代時，不同的革命者所表現出的情感樣態差異；情感能量關注的是，真正推動地方革命組織落地與發展的地方青年自身所具有的情感強度，高強度的情感能量能夠營造革命氛圍、帶動和吸引身邊更多的青年加入共產革命；最後，本文還討論了情感交往問題，具有高強度情感能量的革命青年在具體實踐中，往往表現出強勢、自我、支配性的男子氣概，這極大地破壞了革命組織內部良性、健康的情感交往形式。

關鍵詞：中共組織創建 情感 個性解放 「五四」青年 童庸生

一 引言

對於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化進程的研究，近年學界的探索更加趨於深刻和豐富，學者從革命參與者的職業、家鄉、學校，以及地理上的沿河交匯、鐵路樞紐等不同角度分析中共早期組織發展所借重的途徑及特點。葉文心發現，地方文化的變革是中共組織興起的關鍵，1920年代初浙江本土社會環境中經濟、文化、教育的深層變革對進步青年所帶來的影響直接推動了上海中共組織的建立^①。針對文化與中共創建的關係，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認為，傳統文化及其象徵符號對革命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影響深遠。她提出的

* 本文相關概念曾提交復旦大學—哈佛燕京學社第二屆「新媒體與社會性別研究」工作坊討論。承蒙孫沛東教授對本文結構與理論方面的指點，恩師楊宏雨、劉宗靈，以及復旦大學博士生陳剛、趙帥、李文賢等對本文提出的建設性意見幫助頗多，在此深致謝意。一如成例，文責自負。

「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 概念為我們揭示了早期中共領導者是如何通過對地方文化(包括語言、文學、藝術、符號象徵、社會意識、社會組織形態)的適應和運用來發起革命、完成動員、爭取支持以及將革命不斷地引向深入^②。除此之外，陳耀煌的研究則注意到革命在不同地區建立與發展的差異性，他認為，在中共早期組織的興起上，北方與南方存在不同的組織特徵，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展現出較強的外來性格，以及對鐵路工人運動有所偏重，對上層政治勢力有所依賴^③。許曉宏注意到早期革命青年的家鄉、學校，以及五四時期參與的社團均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中共組織的建立與發展^④。應星發現，江西南昌第二中學是以同心圓的模式向外延伸革命組織，而南昌第一師範學校則是以網格狀的形式進行組織性的擴張，不同學校形成差異的原因，則來自籍貫、交往以及學校領導層的政治偏好^⑤。此外，中共對於傳統組織，諸如同鄉會、姐妹會以及秘密社會的借助與利用，也是其組織早期發展壯大的推動因素之一^⑥。

由此可見，關於中共的創建史及其早期的組織化研究，愈來愈多的學者注意到其內在的複雜性、曲折性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偶然性與不可複製性。對於後來的研究者而言，對這段歷史的深入研究需要更多的想像力以及更加深入、細膩的研究視角予以豐富。本文即是在已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對早期中共組織發展的潛在推動力提出新的着眼點，即不同成員之間的情感差異對革命組織早期的結構性運轉起到怎樣的推動或制約作用？甚麼樣的情感表達和情感強度可以推動中共早期組織的發展？情感的複雜性、多變性又是如何塑造了革命組織早期動盪與脆弱的人際交往？

就概念而言，人類的情感是由文化、社會結構、認知和生物力量複雜交互作用的結果^⑦。五四運動以來，地方進步青年在進入革命組織之初，不同的情感體驗本質上是由個體的人格特質(生物性)、家庭階層(社會結構)、自我認知(視野、受教育水平)以及在理解共產主義文化時所表現出的差異性所共同造成的。情感研究學者通常把高興、恐懼、憤怒和悲傷作為人類普遍的情感^⑧。在此基礎上，上述四種情感進行排列組合而進一步形成了較為複雜的情感，如愉悅、期待、羞愧、內疚、焦慮、鬱悶等。本文所關注的，是從強調「個性解放」的五四時期過渡到強調「集體主義」的革命時期之際，不同的革命青年在感知文化變革時所呈現出的情感樣態差異。譬如，有的青年在革命化的過程中，逐漸表現出消沉、沮喪、鬱悶的情感，進而在行為上逃避組織責任，甚至最終選擇退出革命組織。與此相反的是，有的青年則表現出激情、愉悅、興奮、享受的情感體驗，進而激發他們高強度的情感能量並帶動和提升所處環境的革命氛圍，以此推動地方革命組織的進一步發展與壯大。

眾所周知，在中國近代歷史中，五四時期作為新舊交替的關鍵節點，尤其是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使「個性」的重要意義受到當時進步青年的普遍認同和接受。五四時期「人的解放」具象為對個性解放的追求。許紀霖認為，五四時期是「個人的崛起」時代，其個性發展的內涵，不僅包含德性，更重要的是意志自主^⑨。王汎森則更進一步地發現，當時的青年「連出風頭、趕時髦、吸引異性、戀愛的方式都有一種微妙的變化」^⑩。

青年對「自我命運」的掌控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與快樂，但對於之後崛起的共產主義思潮以及中共組織的興起而言，強調自我與個性顯然成為中共紀律原則與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障礙。如果將中共早期的創建與發展置於個性解放、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大背景下進行思考，則較容易理解為甚麼在1920年代早期地方黨、團建立之初組織內部極易出現的意氣之爭與瑣事糾紛常常被歸咎於革命青年的個人主義^⑩。對此，中共中央在早期不斷要求各地革命青年建立「健全的……『集體主義』的人生觀……反對個人主義」^⑪。

不難發現，如果將早期中共組織史研究的關注點放在五四時期向革命時期過渡的內在延續性本身進行思考，則中共地方組織建立之初不斷面臨的失序與崩潰，實際上是「五四」一代青年學生對其私人領域政治化的逃避與反抗。中共作為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政黨，與成熟時期的政治高壓不同，在1920年代初，黨組織如何看待革命參與者的情感體驗？甚麼樣的情感表達能夠推動地方革命組織的前進？情感對於早期中共而言，是一個亟需規範、又難以有效約束的難題。因此，為了更好地論證與解釋相關問題，本文通過對「五四」青年革命經歷中的情感體驗、情感能量以及情感交往進行分析，來觀察中共早期組織發展與地方「五四」一代青年之間的情感糾葛；而對早期革命內部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進行梳理，是我們理解此後不同階段中共組織行為與自我運轉的關鍵。

二 早期中共地方組織的真實處境

將中共革命進程的開端，尤其是將複雜、多變又難以約束的地方革命組織的興起置於任何簡單、線性的邏輯框架中理解，都難免與事實不符。在1920年代早期，對於革命組織在不同省份的創建與發展，具有全國性視野的共產主義領導者面臨着諸多的困境與挑戰。例如，如何剝離傳統思想對進步青年的禁錮和牽絆？如何將當時浸潤在大眾輿論及主流話語中的青年推向共產革命？如何勸說地方青年擺脫對課業、戀愛、生活的依賴而為無產階級的利益奮鬥？

實際上，在早期中共領導者看來，地方學生的革命洞察力、敏銳度，甚至連交往、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等都與共產主義革命相差甚遠。恽代英在1924年發文稱：「現在的學生……因為受了父兄師友的蒙惑，或沉淪於無用的學業，或放蕩於濫調的文藝」，「一般學生，都被軍閥的機關報，弄得迷三倒四；曉得改造中國，宣傳革命的，實在少的很」^⑫。同年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在給上級的調查報告中，印證了恽代英的判斷，其調查發現：「成都有大小學校百餘座，……有革命思想而又能着手進行的，約佔十分·五〔原文如此，即百分之五〕；江蘇南通青年團的調查結果與四川類似，其稱：學生群眾之趨向：讀死書的佔百分之五十；反動的佔百分之十；浪漫的佔百分之三十；革命的佔百分之十」^⑬。1926年南京青年團在對該市青年學生進行的調查同樣印證了恽代英的結論，其調查稱：「一般學生群眾的趨向大半讀孔書，浪漫者次之，反動

者又次之，革命者最少。」¹⁶由此可見，對於當時大多數地方學生而言，戀愛、學習，甚至享樂等遠比社會改造、政治變革這些政治追求來得真實，也更具現實意義。羅章龍回憶：「五四以後，北大師生中對革命有遠見、有抱負的只是極少數出類拔萃的『北大』人，其餘大都屬洋迷、官迷、財迷或兼而有之的世故派。」¹⁶

就當時的輿論、社會，甚至家庭環境而言，要對各地青年建構起一套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意識和身份認同遠比想像中困難，即便是那些具有革命傾向的學生，也往往被課業、感情等問題所困擾。1925年，南方大學的青年學生王勇德對於朋友在處理戀愛與革命關係時的表現感到困惑，他稱其朋友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很能工作而且熱心，但是現在一切都消沉了，除戀愛以外都不能引起他的興趣¹⁷。由此看來，地方進步青年對於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追隨往往表現出一種盲目感性的心態和好奇的心理，中共早期四川黨組織領導人楊闇公曾在1924年10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本團〔重慶青年團〕各員，有因一時的衝動或好奇心的驅使加入的，真能了解真諦，由救人而發的，着實還少。」¹⁸張國燾在回憶自己1920年代早期的政治傾向時亦承認，「我雖抱有從事共產主義運動的意向和熱情，但還只是一種空洞的想法，是偏於興趣方面的，還沒有以這一運動為終身事業的堅決打算」¹⁹。

實際上，早期革命組織內多數地方青年對於共產主義並無多少深刻理解，往往將革命組織視為一個普通、平常，甚至隨便的組織²⁰，他們在思想、行動以及情感態度上仍呈現出時代性與傳統性的延續。1926年，上海青年團對其內部一百多名革命者進行了觀察：「在這一百多同學中，思想可分為幾點：1.對於個人的利益看得比團體的利益重；2.宗法社會的思想——如對於家族的觀念，尊孔的觀念，信仰鬼神的觀念，男女的觀念——仍縈迴於腦際；3.對於共產主義多不知是甚麼——因為對於主義明瞭的程度少，所以對於團體的信仰亦當因之減退。」²¹上海青年團的調查和分析不僅證明了早期革命參與者受傳統與現實影響的客觀存在，也說明了早期地方革命組織內的複雜性、差異性以及統一組織行動力的艱難，多數地方革命組織在早期均不同程度地出現過停滯、解散等局面，如予以深究，地方革命者由於先天條件、階層差異、生活閱歷以及對共產主義認識的差別而形成情感差異，相信是導致早期革命組織難以有效協作的本質原因。

三 早期革命青年的情感體驗及現象

如前所述，王汎森對「五四」青年的研究發現，愛出風頭是當時進步青年的一種普遍的狀態，而在情感分析中，愛出風頭實際上是一種虛榮、得意的情感活動，是過份表現自我，在群體中強調自我存在的一種情感表達。五四運動後，在地方革命組織興起的過程中，愛出風頭的現象不可避免地滲透進中共的組織肌理之中。例如，重慶青年團的創建者、青年學生唐伯焜不斷堅持將青年團書記的稱號印在其個人名片上，而對於組織的發展及運作卻無多

少系統見解，以至於早期重慶青年團只是空有其名²²；江西九江早期團組織的領導者溫眷血，在上級巡視時發現其做事有不切實際、包而不辦的現象，並且愛出風頭，無論寫甚麼信，都要用印有團體名義的信封²³。針對這種現象，當時的中共領袖恽代英懇切地告誡各地革命青年：「我不是勸你們組織一個小團體，來出風頭，嘗一嘗做個小頭目的滋味。」²⁴這樣的勸誡在革命組織內亦時有提及，國共合作時，廣東青年團一再勸說其團員，「不要和國民黨爭無謂的風頭和用不着的權力，吃苦的工作我們自己拿來做」²⁵；上海青年團則更進一步地強調，「革命的工作沒有大小的分別，都是很重要的，絕無甚麼好玩的或出風頭的」²⁶。然而，這樣一種規勸對當時的「五四」青年來說，實在太過苛責，在革命學生汪壽華看來：「好出風頭好諛惡謗者，人之情也。」²⁷

革命青年愛出風頭大大降低了地方革命組織的運轉效力及革命純潔性，而急躁、偏激則成為導致地方革命走向消沉甚至破裂的罪魁禍首。根據情感研究學者特納 (Jonathan H. Turner) 等人的分析，激動、不滿、氣急敗壞等屬「強硬—憤怒」這一情感維度範疇；而根據康乃爾 (Raewyn W. Connell) 的研究，推崇英雄主義、熱衷競賽則屬支配性、霸權性的男性氣質²⁸。在地方革命建立之初，這類情感頗具典型性。1923年，恽代英在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成都高師）授課時發現，當地青年團的領導者王右木常常因為性格的急躁而與組織內的其他成員產生爭執，「此地王右木君，確為熱狂而忠於中央者，惟支配欲太盛而偏狹躁急，每與其他份子多意見耳」²⁹。這類情感充沛、極易衝動的青年對於自己在革命中的表現亦常感焦慮與自責，王右木曾坦言：「我性情急躁，不易得人信賴，常在被攻擊中過日子。」³⁰與王右木感同身受的還有安徽革命青年顧耕，他自我反省道：「我一腔熱血，在體內沸騰，我恨不能把壓迫階級頓時鏟除，同時恨我自己沒有手段，不會應付環境與敵作戰，致遭外人的非議。……我本身是個極受壓迫的青年，自然對於我們的任務越發感覺極重大而且是急需的。因此我的行動每操之過火，失敗亦因之而生。這是我性急的大缺點。」³¹

急躁、氣急敗壞等情感表達給中共早期的發展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對此，當時的革命領袖一度認為：「中國真革命家亦少，有之則每只以褻急勇悍見長，只是一個打衝鋒的勇士，不是一個革命的政治家。」³²在當時具有全國性視野的革命領導者看來，這種「褻急勇悍」的地方青年，對於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持續發展並無多少貢獻，「青年學生一時血氣之勇，他能冒犯任何困難危險都不懼怕，但他們討厭做長期的按步就班的宣傳組織工作」³³。

愛出風頭、氣急敗壞等情感體驗常見於地方革命早期的積極份子或領導者之中，而抑鬱、焦慮等情感體驗，則更多表現在佔大多數的革命追隨者之中。五四時期，地方知識青年重視自由，愛好在行動中表現自我，往往對紀律約束感到厭煩。在廣東早期革命領袖阮嘯仙看來，「浪漫式的小資產階級化的學生們，忽視團體紀律，甚至於發生厭惡之有團體束縛」³⁴。對革命紀律的逃避和厭惡為革命追隨者帶來了極為消極的情感體驗，這類青年在行為上表現出對革命組織較低的依賴性、較低的共同責任感，以及對革命行為較低的情感喚醒能力。因此，在早期的革命組織中，常常會出現個人行動而較少集

體行動。譬如，在江西九江，當地的青年團成員中只有少數能夠進行團體化的工作，大多數學生（團員）更喜好個人行動^⑳。對於這類青年的革命態度，四川青年團書記感到失望，常常無奈地稱：「管你民權〔運動〕也好、女權〔運動〕也好、勞工〔運動〕也好、讀書會也好，皆曰我學校要試驗！要忙了！及試驗畢，又大家熱心回家去了。」^㉑

除了沮喪、抑鬱、消沉的情感體驗外，另一種情感同樣也降低了革命青年的奉獻意識與犧牲精神，即恐懼感。恐懼感是在真實或想像的危險中，個人或群體深刻感受到的一種強烈而壓抑的情感狀態，當恐懼導致對未來高度的不確定時，將導致怠惰^㉒。我們可以看到，在具體的革命情境中，部分青年喜歡高談闊論，而對具體的革命活動心生畏懼。中共湖北組織報告稱，「學生好批評而不努力工作」^㉓，甚麼事都好像同他們無關，心總不熱起來，無做事的興趣^㉔，而一旦外部環境惡化，多數學生便情緒消極，甚至懼怕實際工作。當時有革命組織稱：「同學的幼稚，加上政治環境的惡劣，系〔係〕不能努力工作，而且怕分配他們的工作，甚至有『不願意了』的表示。」^㉕地方革命青年厭惡紀律約束、懼怕革命工作的情感表現對革命組織早期的執行力造成了嚴重的傷害，濟南地委無奈地稱：「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之構成成份，大多數為小資產階級出身，富有天生的自由思想及浪漫色彩，缺少集體化團結的精神，不能執行團體的紀律，個性不喜容受團體的批評，以致團體組織和紀律渙散，下級機關時常不能執行上級機關的命令和決議。」^㉖

實際上，上述這類早期革命追隨者大多並不是經過深思熟慮而決定投身革命的。他們之中，或許是在一次演講中受氣氛的感召而情緒化地決定加入組織，或許是當學生運動失利後，在極度氣憤的情感中決定借助革命以達成目的。韋伯曾將人的社會行為概括為「目的理性」、「價值理性」、「情感性」以及「傳統性」。其中，情感性是指人的行為受現時情緒或感情狀況的支配和影響^㉗。以此看來，就早期革命內部的多數學生而言，僅通過理性行為來解釋他們參加革命的動機顯然忽略了歷史的戲劇性與豐富性，起碼在同一個時代的胡適看來，「頭腦太細密的人，顧前顧後，顧此顧彼，決不配做革命家」^㉘。

四 地方革命青年的情感能量及其實踐

情感研究學者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曾對「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 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觀察和分析，他認為情感能量可以使人們的熱情澎湃高漲或一落千丈，從而導致人們或踴躍地參與互動或退避三舍^㉙。換言之，情感能量是表達情感意願的程度，高強度的情感能量能夠感染和影響所處群體。

事實上，早期地方革命組織的創建主要依賴的是那些具有高強度情感能量的知識青年。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真正能夠推動地方革命的興起與發展，並符合中共領袖期望的情感能量的個案在早期地方革命中極為稀缺。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類具有高強度、積極情感輸出的地方青年在早期共產主義事業中往往身兼數職，甚至成為某地苦苦支撐革命事業的唯一力量。上海

青年團立達支部發現，其組織發展差不多全是依賴書記一人的努力，其餘同志多頹弛^{④5}；安慶青年團的早期革命工作同樣集中在個別負責人身上，以至於每個負責同志往往身兼四五項事務^{④6}。當時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領袖施存統發現，青年團「只有少數人活動而多數人不管事」^{④7}。不難看出，這種現象將導致早期地方革命組織的興衰往往高度依賴個別積極份子的情感能量。

因此，我們甚至可以大膽認為，早期共產主義革命在地方上的興起與發展，主要仰賴少數具有革命潛質、同時又能夠將自己的情感能量運用到革命日常中的骨幹成員，他們往往是維繫和保障地方革命事業持續運轉的核心力量，這些在早期革命中具有難能可貴品質的地方青年在中共革命的歷程中不斷成長與蛻變，成為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地方幹部的主要來源，甚至最終成為黨內精英。

實際上，儘管注意到早期革命實踐中存在諸多不利於組織發展的情感樣態，但在中共領導者看來，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同樣存在。惲代英常常教導地方青年：「為作社會運動家必要的品性。故必須注意下列八種德目。(一)誠信，(二)勇毅，(三)勤儉，(四)敬慎，(五)急公，(六)負責，(七)博愛，(八)進取。」^{④8}這些內容雖然帶有十分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但對人生觀的規訓與形塑證明了早期共產主義運動試圖影響和重塑地方青年情感體驗的努力。1925年，江西吉安青年團在內部會議中對其成員的行為方式與情感表達提出了要求：「……不為學校及家庭之虛榮所轉移；6、有犧牲的決心和行動；7、宜極力參加任何團體的工作；8、力避浪漫、嬌奢、虛偽之惡習。」^{④9}可以看出，在共產主義運動興起之時，地方革命組織便已經開始通過規範行為來試圖影響和重塑革命者的情感體驗。然而，這類抽象、難以操作的工作在早期的革命實踐中究竟能否產生效力？符合革命要求的地方青年在日常生活以及情感表達中究竟處於怎樣的一種真實狀態？為了更好地說明上述問題，筆者以四川地區早期的革命先驅、五四時期的地方青年童庸生為例進行說明。

童庸生，1899年3月出生於四川巴縣永興鄉宜家橋（今屬重慶市巴南區惠民街道）。五四時期就讀於成都高師的童庸生受留日教師、四川共產主義先驅王右木的感化與影響，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潮^{⑤0}，並於1922年10月自發建立了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初，童庸生畢業返回重慶並參加了重慶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在此期間，他相繼擔任了委員長、書記、秘書、宣傳委員等職務。1925年3月，童庸生前往北京參加國民促進會，來年又與楊闇公、吳玉章等南下廣州參加了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1926年2月，童庸生、楊闇公等人在重慶建立中共重慶地委；12月，為了響應北伐，童庸生協助劉伯承發動瀘順起義，並擔任黨代表，負責起義中的組織、宣傳工作。起義失敗後，年僅二十七歲的童庸生由中共保送前往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和列寧格勒軍政學院學習，並於1932年1月學成回國。兩個月後，童庸生在由上海返回四川繼續進行革命時意外失蹤。1945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追認童庸生為革命烈士^{⑤1}。

不難發現，在童庸生一生短暫的革命經歷中，他通過中共組織的歷練和影響，在視野格局、人際交往以及前途命運上都有了顛覆性的改變，革命組織重塑了童庸生的精神樣態與情感體驗，並使其在革命活動中逐漸從一名稚

氣未脫的地方學生蛻變為全國性的革命骨幹。可以說，以童庸生為代表的一批「五四」地方學生，在進入革命組織之初，往往情感純粹、動機單純，並沒有過於複雜的社會網絡，在對共產主義產生興趣和嚮往的過程中，他們不斷表現出對革命領袖的景仰與崇拜。童庸生在投身革命之初，便常常因為自己經濟困難，無法前往上海追隨中共領袖而感到沮喪和懊惱，他常將自己的這種無能為力歸咎於「命運乖奇」^{⑤2}。同時，作為一名普通的地方學生，童庸生的人際網絡和活動軌迹主要集中在四川，對於以江浙青年為主、大部分為留日學生的團中央領導，童庸生無論在歷史層面還是現實交往中都無過多交集，以至於團中央對來自重慶青年團的童庸生一度產生猜忌和懷疑。對此，童庸生悲傷地稱，在渝的工作「不遭中央批准」，以至於「一息三歎，壯士垂泣」^{⑤3}。

然而，即便在自己情感受挫的情況下，童庸生依然真情坦言「中央批准與否，顧所不計，唯知力進，心乃方甘耳」^{⑤4}。這種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執著與堅韌一直是童庸生革命情感的底色。與童庸生關係密切的楊闇公深刻感受到他對革命事業的摯熱情感，在日記中寫道：「庸生是個很有血性的人，今天與我的談話，他聲淚俱下，真令人心感，足見他對團體的熱忱了。」^{⑤5}由信仰而產生的執著與奉獻是推動早期革命興起的關鍵。恽代英發現，「革命之實現，必須有許多人努力的宣傳，與勇敢的活動，所以這須許多人先有一種白熱的感情以協力進行，才可以做得成功」^{⑤6}。這種白熱的情感本質上是由激情、興奮、自信、堅持等情感因素所綜合構成的，而這種複雜的積極情感始終貫穿於童庸生的革命實踐之中。根據楊闇公日記記載，童庸生常常與其就地方革命組織的規劃、章程，甚至內部事務對談至夜裏兩三點，致使楊闇公神經興奮，夜不能寐：「庸生來寓，作長夜談，至三時半才睡，因回想過去和將來，思潮起伏，不能安眠。」^{⑤7}又稱：「入夜庸生來寓，共談至二時許才就寢，對今後的規劃，已略具端倪了，努力做去，必能得一種良好之果。」^{⑤8}因此，我們不難發現，這種對革命工作的激情、興奮、享受、滿懷希望的情感體驗往往能夠激發地方青年的革命鬥志，給予他們克服恐懼、擺脫消極情感的勇氣和力量。



1922年10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領導合影，圖左起：吳玉章、童庸生、廖劃平、楊闇公。
(資料圖片)

當然，這種情感體驗大多緣起於參與革命之初的新奇與亢奮，當這種暫時情感逐漸冷卻後，革命青年究竟依靠甚麼樣的情感狀態來繼續艱苦、繁瑣，甚至枯燥的日常工作呢？當時的進步青年，尤其是革命組織內的地方學生，普遍擅長理論的研究而缺乏具體行動。1922年11月，共產國際早期領導人拉狄克(Karl Radek)觀察稱：「那裏〔中國〕有許多我們的同志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像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⑤當時各地的青年團也普遍存在學術至上論的嚴重傾向，脫離日常的實際鬥爭，主要是脫離廣大青年工人群眾^⑥。1926年7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稱：「同志都缺乏理論及確定的革命人生觀，尤其是很少能將理論活用到實際工作上去。」^⑦對此，安慶青年團書記李竹聲甚至要求在介紹和吸收新團員加入團組織時，須注重在外活動有幹才者^⑧。

然而，與這種風氣截然相反的是，在早期的革命實踐中，童庸生對空談革命往往不屑一顧。1922年10月，童庸生召集成都高師激進學生成立了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對於成立的動機，童庸生稱：「大家想，辦報來宣傳和學會來研究固然好，但是莫有一種真正一種做革命事業的團體，這真精神，終究不能結合來實際施行，不過空談罷了，所以想結合團體的心理，就在今年夏季勃然而生。」^⑨

根據情感社會學家的研究，人的情感體驗和表達都密切地與身體聯繫在一起，情感是一種動機力量，它們不僅使人們的主觀體驗有序，而且賦予人們以力量，指導行動的方向^⑩。因此，高強度的情感能量一定與活躍、積極的行為方式緊密相連，而對革命信仰擁有高強度情感能量的童庸生勢必會在行動上表現出踴躍參與、重視實際的傾向。

1924年，在擔任重慶青年團宣傳委員時，童庸生過於頻繁地在各個學校發放傳單、開展演講、組織讀書會等，招致重慶學界的警覺與打壓，最終導致他無法繼續在重慶立足^⑪。對於童庸生的情感能量與執行能力，楊闇公欽佩地稱讚他「做事很能中節，真團中的健者」；童庸生亦常對革命同行者講：「人們在社會中的歷史，只有奮鬥和戰爭，懦弱不前的常受天然的淘汰，決難生存於世。」^⑫顯然，童庸生能夠做到言行一致，並以積極的、高強度的情感能量持續帶動和感染身邊其他革命者，許多與童庸生一起參加革命的青年均評價其「對團體很努力……對團體工作很熱烈」^⑬。8月，童庸生在渝已難立足，在準備遠赴涪陵繼續革命時，楊闇公遺憾地寫道：「庸生一二日內將離渝，〔唐〕伯焜在此，必不能有他那樣的活動力。」^⑭

除了激情、興奮、享受的情感體驗和踴躍參與、以身作則的情感能量外，真正使童庸生獲得同伴擁護與組織認可的是他的另外一項先天優勢，即出眾的語言天賦。語言天賦本質屬人格特質範疇，它是思維、邏輯與情感表達的結合體，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不僅提高了情感輸出的效率，同時還增強了自身情感的感染力。

在中共革命早期，如何將晦澀難懂的革命概念及意識形態內容通俗化，特別是如何勸導地方青年理解、接受並擁護革命事業，一直是共產主義領袖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眾多可行方案中，將地方革命者變為宣傳者，要求其在

日常生活中，特別是在親朋好友的私人交往中進行主義的宣揚與傳播成為最有效果、也是最為實際的辦法。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明確要求：「共產黨員人人都應是一個宣傳者，平常口語之中須時時留意宣傳。」^⑥在這種組織要求下，地方革命領導不斷敦促其成員「多與非同志接觸談其切身問題，聯絡感情，灌輸思想，引導上我們的路」^⑦。

然而，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懂得隨機應變，靈活運用各種方法將革命內容清晰、流暢地表達出來，同時又能夠準確無誤地使聽者理解甚至同情革命的地方青年少之又少，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或過於生硬、或由於膽怯而根本無法開口。語言表達能力的不足大大降低了情感輸出的強度與感染力，而這勢必降低革命組織的影響範圍與組織規模。因此，恽代英不斷告誡各地同志：「我們在不合宜的時候，不要說出甚麼主義，甚麼黨，亦不要說些過於駭人聽聞的言辭。我們要把主義的實質，就各種日常問題指示出來，使聽的人容易而且樂於承受。」^⑧為了更進一步傳授和教育地方革命者，《中國青年》多次刊文專門就此問題進行詳細論述。1925年7月，標題為〈這樣做一個宣傳家〉的文章稱：「你對人家宣傳的時候，要表示出來你自己很有把握的態度，但不可驕傲誇大，惹起被宣傳人的反感。你既擔負了宣傳的責任，不要怯懼，無論你說得好與不好，膽子放大些……對於被宣傳人要有充分的好感，不要有一絲一毫藐視被宣傳人，或自己剛愎武斷的態度。」^⑨

對此，地方革命組織甚至把「提升說話能力」作為訓練成員的工作重點。南昌青年團多次要求其成員「多練習說話」^⑩；安慶地委要求支部會及小組會指定同學做政治報告，使同學每人均能由此練習說話才能^⑪；九江青年團乾脆採取團員輪流演講的辦法，先對着自己的同志演講，使人人養成演講的能力，然後向群眾演講^⑫。

不難發現，革命領袖與地方組織不斷要求和訓練革命青年的語言表達能力，本質上是希望藉此提升革命傳播者的情感能量，以此來感染和吸納新的青年加入組織。然而遺憾的是，就實際效果來看，多數地方革命青年無論是語言能力、表達技巧，抑或是在情緒感染力、親和程度上均與革命領袖的期待相差甚遠。恽代英稱：「他們平時雖然亦常常說話，然而所說的話，是片段的，無系統的；他們從來不曾說過十分鐘二十分鐘以上的有系統的話。」^⑬上海青年團亦發現，在其支部或小組會上，各同志都不肯提出問題，怕說話，部委報告後各同志不肯發言，養成依賴部委的惰性^⑭，而在對外宣傳工作上，一般同志又不懂宣傳與煽動的方法，宣傳太政治化而沒有做到普通的、淺近的宣傳^⑮。

然而，在早期的革命隊伍中，亦不乏天生就能言善辯、機警靈巧的革命青年。重慶青年團在1925年報告稱：「同學宣傳特別優良的，能善於利用環境，如軍人多時則講兵士的疾苦。」^⑯在這方面，童庸生天生就具有極強的表達欲，並且善於利用技巧，審時度勢地將自己的思想觀點「兜售」出去。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身邊朋友猶豫不決，將決未決時，往往童庸生幾句話便能說動對方「下了最後的決心」^⑰。

善於表達、富有感染力的人格特質對於宣傳革命工作同樣裨益良多。1922年，與童庸生一起參與建立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進步學生陽翰笙回憶，「童庸生在會上口若懸河，侃侃而談，大講社會主義是怎麼一回事」^⑥。在與童庸生的交談中，楊闇公亦常被其語言魅力所傾倒，楊稱「與之對談一切，不覺精神大振，心內的苦痛亦全忘卻矣」^⑦。2018年7月，童庸生的後人張繼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曾經聽姑婆說過，表外公〔童庸生〕說話聲音洪亮，演講特別有說服力。有一次在演講中，童庸生指着長江中橫衝直撞的外國輪船控訴帝國主義的罪行，還摘下自己的帽子，問在場學生，帽子的材料多少錢？帽子做成後在市場上又賣多少錢？工人得到了多少工資？資本家又從中賺了多少利潤？以此來說明剩餘價值的含義。」^⑧

可以看到，童庸生在革命經歷中表現出的行為方式、情感態度以及奮鬥意志等，儘管無法完全符合前述渾代英所提及的八項要求，但就其革命前途而言，童庸生所表現出的情感能量無疑是受到了黨組織的肯定與支持。因此，在童庸生的個案中我們發現，在早期的革命實踐中，能夠將抽象的革命信仰轉化為實際的行動，在革命工作的日常實踐中能夠體驗到實現自我價值的愉悅與興奮，擁有並且能夠利用語言天賦來提升自己的情感強度與情感輸出，藉以達到影響更多地方青年革命者，往往是推動早期地方革命事業有序發展的關鍵力量。這類青年一般能夠在早期的革命運動中脫穎而出，成為日後黨所栽培和倚重的革命骨幹^⑨。

五 革命組織中的情感交往

作為後「五四」時期的一種組織性嘗試，早期中共領袖對建立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科層化組織所可能面臨的挑戰顯然準備不足，僅是來自各地黨、團員的情感差異就已經讓中共組織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同時，本文儘管對早期革命組織中的情感樣態作出了一定的梳理，但真實的革命現場可能依然存在複雜、多變且不可捉摸的情感樣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來自不同地區革命群體內研究樣本的多樣與龐雜；另一方面，同一歷史人物的情感體驗也往往呈現出多變性與矛盾性。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認為，男性氣質不存在於一種單純的狀態之中，而是多層情感共存並相互矛盾的，每一個人格都是充滿差異的複雜建構，而不是一個透明的單位^⑩。因此，當我們在觀察和分析早期革命人物的情感樣態時，不能過於簡單地給出一個非黑即白的評價或結論；同時也必須承認，對情感表現的評價本身也帶有極強的主觀色彩，因應不同的革命者自身性格、經歷以及革命分工的不同，我們很可能對同一人物的評價截然相反。早期革命領袖實際上已經敏銳地發現情感能量與革命效力之間存在的複雜張力^⑪：

越是有力的黨員……越是容易鬧出許多的意見。他們因為自信力太大，所以他們決不反省自己方面的過失，把一切過失都加到對手方的身上。

他們因為感情太豐富，所以他們為了無關係的言語態度，都會發生出許多反感。他們因為競爭心太盛，所以他們對於在虛榮與權力超過於他們的人，不免要處處發洩他們的不甘居於人下的心理。他們因為意志力太強，所以他們一為誤解或感情所障蔽，明明知道自己所見未必全合理，然若在不能完全勝利的形勢之下，他們寧願用種種方法，堅決貫徹自己的主張。這樣有力的黨員，在合當的時機，都會是勇健的革命戰將；但是在革命的主義與策略果未能明瞭的時候，卻成了革命的障礙力。

這一分析無疑是準確的。以童庸生為例，儘管他對重慶青年團的發展貢獻頗多，但如果回到真實的歷史場景中，我們依然可以聽到對童庸生在工作中所表現出的情感能量不滿的聲音。譬如，與童庸生一起參加革命的部分青年認為：「庸生同志……因對團體工作熱烈的緣故，態度上有些不好，致對同志間引起誤會」，「庸生對團體工作雖誠實但個性強烈，有左傾幼稚病」，「庸生個性甚強，批評同志甚致（至）於謾罵，故很容易引起誤會」^{②7}。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早期革命實踐在既缺乏制度約束、同時又無絕對權威或組織高壓的情況下，地方革命者無論表現出何種情感樣態都可能招致其他人的誤解、詆譏，進而不斷產生各種各樣的組織矛盾，而相互猜忌、衝突，甚至攻訐就構成了早期革命交往中常態化的情感模式。在中共革命的早期階段，常常可以看到各個地方組織中同志與同志之間的不和，「他們天天不是口角就是爭吵」^{②8}，而地方組織對於應付和處理這類矛盾常常感到筋疲力盡。上海青年團書記自接任以來便發現，其組織成員李碩勛、粟豐二人因為成見和嫉妒等原因而從來沒有和氣講話過^{②9}，同志間時常為了很小的事情發生誤會，因誤會而引起衝突，部常委忙於調解此種無味的糾紛^{③0}。

對於同志間這種日常衝突與攻擊性的情感交往，中共嘗試了諸多方法進行補救。1924年5月，在區委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湖南黨呼籲：同志中萬不可互相猜疑，應該互相信任，更宜努力工作，從行動上證明自己是一個忠實的黨員，不要鬧無謂的意氣^{③1}；南京青年團則在內部會議中一再強調：我們十分盼望，我們的團體裏面，嗣後無論發生甚麼問題，大家總宜平心靜氣地從長討論，不宜動用感情，致生枝節^{③2}；徐州地委寄希望於通過友善的相互批評來化解內部糾紛，並詳細地列出了批評涵蓋的內容，包括思想、行為、性情、態度、精神、活動能力^{③3}。然而，組織會議中的相互批評更加激化了內部成員之間的衝突，批評常常演變成無休止的口角之爭，為了防止內部成員在批評會中發生語言衝突及情感對立，南昌青年團規定：「一、批評者宜以團體為出發點，切忌以個人觀點批評一切。二、批評時態度宜和藹，言語宜從容而明瞭。三、批評時如有過於偏激或互相發生無謂之爭辯時，支書應即停止其發言。」^{③4}

遺憾的是，相應的補救措施及團結性的呼籲並沒有在客觀上減少早期革命內部的矛盾與衝突，不受約束的情感表達與主要依靠個人感情來維繫的地方組織因此變得異常脆弱，任何細小的誤解與衝突都會使組織面臨停擺與癱瘓的風險。在國民黨1927年大範圍「清共」之前，這些問題始終存在於中共的地方

組織之中而無法徹底解決。大革命失敗後，隨着革命場域由城市轉向農村，相較於早期革命，土地革命時期中共軍隊的出現無疑大大強化了紀律約束與懲罰威懾的力量，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革命組織的紀律性與凝聚力。

六 結語

閻雲翔曾在其著作《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中，將個人情感納入私生活領域的研究之中，並且認為：「以個人為中心的民族志研究，在當代已經開始着眼於『個人體驗』以及個人的『主體性』，而不是社會結構與文化規範。」^⑤實際上，重視研究對象的情感體驗本質上是將活靈活現、帶有溫度與感知能力的「人」帶回歷史現場，而這方面的研究卻是以往革命史學者所容易忽略的。

本文以情感作為觀察和理解中共早期革命實踐的一種視角，還原了地方革命組織豐富、多樣的情感樣態。1920年代，在共產主義潮流席捲之下，地方革命組織的在地化過程，其內部細節性、瑣碎性的問題常常被學界所忽視，儘管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共的組織規模呈現出指數級的增長，但對早期革命內部所暴露出的問題進行梳理，依然是我們理解此後不同階段中共組織行為與自我運轉的關鍵。僅就本文來看，革命早期內部成員之間因人格特質、家庭階層、自我認知以及感知文化變革的差異而形成的行為分歧與情感矛盾，依然存在於土地革命及抗戰根據地時期。因此，對中共組織成員情感的長時段研究，或許能夠讓我們對延安整風的必要性與緊迫性有更加深層和歷時性的理解和體悟。

由此看來，情感社會學與中共黨史的結合是一種有效的跨學科嘗試，本文便是在這種理論範式的啟發下，試圖給予中共情感研究源頭式的剖析。回顧中共革命各個階段的自我建設與發展，始終存在黨員真實情感與集體性表達規則之間拉鋸式的博弈。

情感研究學者認為，當所表達的情感一而再、再而三地與內在感受相分離時，自我疏遠、異化和不真誠感將由此產生。有社會學家認為：人們真實的、深刻的和內在的自我，要麼寄居在組織的、規則的行為中，要麼寄居在衝動的行為中。在組織意義上，人們關於「我是誰」的感受將隨着他們對組織規範遵守的累積而明晰；而在衝動意義上，人們將從更具有自發性的行為中揭示自我的意義，這種自發行為常常違背規則期望，它是一種非抑制的情感表達，是游離在組織規則和慣例之外的^⑥。中共早期地方革命之所以暴露出嚴重的組織問題，實際上是「五四」地方青年真實的情感表達戰勝中共集體主義約束的一次短暫性勝利，是情感的衝動意義戰勝情感的組織意義的一次短暫性勝利。而隨着中共組織規模與意識形態建設不斷的深入與強化，黨員個性與表達自由逐漸式微，黨性與集體主義開始佔據支配地位，黨員在平衡遵守組織約束與堅持自我表達之間的努力趨於瓦解，「抑制自我、否定自我、消滅自我」開始成為中共黨員情感生活與精神世界中的一種常態化現象。

延安整風時期，黨組織通過政治高壓的方式無休止地抨擊黨員的個人問題，不斷推高緊張窒息的政治氣氛，由此而產生的情緒危機最終擊垮了眾多黨員的內在意志。在整風運動開始前，革命學生沈霞仍未脫離個人主義的情感印記，她自我總結道：「我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絕對濃厚的，……這個東西來源是因為自己在家庭中的思想就是主張絕對自由，強調個性的。」而在整風運動進入白熱化階段時，沈霞開始堅信：「在黨的原則下，私人感情等於灰塵，個人感情應該是像鐵鍋裏的冰塊，不能存在一分鐘，一秒鐘。」^⑦

可以看到，黨員真實的情感體驗與革命意識形態造就的組織約束之間所存在的尖銳對立直到延安整風時才達到了衝突的頂點，但二者微妙的對立關係可能自中共建立之初便已經存在。同時，二者之間此消彼長的動態關係並不會隨着中共在政治上的勝利而消失，長期關注中共革命的西方學者魏斐德 (Frederic E. Wakeman, Jr.) 曾將毛澤東在建國後提出的「繼續革命」理論總結為客觀歷史與主觀意志之間的博弈^⑧。其實，在高度意識形態化與強調集體性的革命政黨中，不僅領袖的意志常遭曲解與挑戰，普通黨員的情感世界與表達意志亦會變得異常渺小與脆弱。然而，或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不僅是對外攻城略地的勝利，更重要的是中共從建立伊始，便十分重視並不斷強調對其成員情感世界的規訓與重塑。

註釋

① Wen-hsin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6-9.

② 閻小駿：〈譯序〉，載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閻小駿譯：《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4)，頁 viii。

③ 陳耀煌：〈北方地區的共產革命，1920-1927——一個組織史的考察〉，《新史學》，第26卷第1期(2015年3月)，頁117。

④ 許曉宏認為，如果加入中共革命組織的新成員沒有五四時期參與社團的經歷，那麼他們極易退出革命組織，因為這些新革命者並不適應中共的紀律要求與組織命令。參見 Xiaohong Xu, "Belonging before Believing: Group Ethos and Bloc Recruitment in the Making of Chinese Commu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 no. 5 (2013): 775。

⑤ 應星：〈學校、地緣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網絡的形成——以北伐前的江西為例〉，《社會學研究》，2015年第1期，頁1-22。

⑥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105、114。

⑦⑧⑨⑩ 特納 (Jonathan H. Turner)、斯戴茲 (Jan E. Stets) 著，孫俊才、文軍譯：《情感社會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7；9；210；3、8。

⑨ 許紀霖：〈個人主義的起源——「五四」時期的自我觀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6期，頁115。

⑩ 王汎森：〈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繫——「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頁21。

⑪ 在給共產國際的信中，張國燾認為「某些支部出現的一些小糾紛也只是因為……黨員太年輕又有些個人主義的東西所致」。參見〈張國燾給維經斯基、穆辛的信〉(1923年11月16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09。

- ⑫⑬ 〈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1923年11月30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頁206；206-207。
- ⑭ 代英(惲代英)：〈學生運動〉，《中國青年》(上海)，第2卷第48期(1924年10月11日)，頁8；〈鄉村運動問題〉，《中國青年》，第2卷第40期(1924年7月19日)，頁12。
- ⑮ 〈張霽帆給團中央的信——關於四川團的工作和各階層狀況〉(1924年)，載中央檔案館、四川省檔案館編：《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內部發行，1986)，頁179；〈團南通支部書記王盈朝給哲生的信——關於南通的青年團組織和各種社團的情況〉(1926年3月26日)，載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1926)》(內部發行，1986)，頁325。
- ⑯ 〈團南京地委關於南京群眾團體情況的報告〉(1926年3月25日)，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1926)》，頁153。
- ⑰ 羅章龍：《逐臣自述：羅章龍回憶統稿》，上冊(台北：九歌書坊瀏水工作室，2015)，頁112。
- ⑱ 代英：〈馬克思主義者與戀愛問題〉，《中國青年》，第4卷第82期(1925年7月18日)，頁481。
- 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楊闇公：《楊闇公日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頁182；229；241；250；107；152；107；100。
- ㉟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80)，頁92。
- 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 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1926年7月)，載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內部發行，1986)，頁329；351；350；332、289；293。
- ㊹ 談上海曹家渡部委二月份工作報告(1926年)，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頁223。
- ㊺ 惲代英給施存統的信——關於重慶團的情況和在川工作打算(1923年2月)，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57。
- ㊻㊼ 秋人致團中央信——九江工作狀況(1925年9月16日)，載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3-1926)》(內部發行，1986)，頁208-209。
- ㊽ 代英：〈驚心動魄的五月〉，《中國青年》，第2卷第29期(1924年5月3日)，頁3。
- ㊾㊿ 阮嘯仙關於團粵區一年來的工作概況和經驗(1924年4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4)》(內部發行，1982)，頁380；376-77。
- ㊿ 汪壽華：〈汪壽華日記·求知錄〉，《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頁58。
- ㊿ 特納、斯戴茲：《情感社會學》，頁13；康乃爾(Raewyn W. Connell)著，柳莉、張美川等譯：《男性氣質》(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05-107、135-41。
- ㊿ 惲代英給團中央的信——請適當指導四川團的工作(1923年6月)，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125。
- ㊿ 王右木給施存統的信——關於在四川武裝工農的設想(1923年5月5日)，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78、115。
- ㊿ 顧耕要求募捐開辦私立小學給惲代英等的信(1926年1月29日)，載中央檔案館、安徽省檔案館編：《安徽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一冊1922-1927)》(內部發行，1987)，頁175。
- ㊿ 惲代英：〈造黨——答陳宗虞君〉(1924年3月8日)，載《惲代英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頁145。
- ㊿ 但一(惲代英)：〈一種機會主義——黨化教育運動〉，《中國青年》，第4卷第87期(1925年8月8日)，頁547。
- ㊿ 團南昌、九江、吉安地委聯席會報告(1926年4月5日)，載《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3-1926)》，頁389。

- ③⑥ 〈王右木給施存統的六封信〉(1923年夏)，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105。
- ③⑧ 〈各委員報告〉(1923年11月30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頁190。
- ④⑩ 〈團徐州地委關於目前政治狀況與團的工作情況報告〉(1926年5月2日)，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1926)》，頁276、283。
- ④⑪ 〈團濟南地委組織問題報告之五——關於團的紀律〉(1926年3月)，載中央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編：《山東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4-1933)》，乙種本(內部發行，1996)，頁37。
- ④⑫ 韋伯(Max Weber)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56。
- ④⑬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三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頁290。
- ④⑭⑯ 轉引自特納、斯戴茲：《情感社會學》，頁63；33、27。
- ④⑮ 〈團安慶地委組織部四月份報告——關於團內外的組織狀況〉(1926年4月30日)，載《安徽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一冊1922-1927)》，頁91。
- ④⑰ 存統(施存統)：〈本團的問題(續十六期)〉，《先驅》，第17號(1923年5月10日)，第4版。
- ④⑱ 惲代英：〈去年下學期的川南師範〉(1922年5月1日)，載《惲代英全集》，第五卷，頁12。
- ④⑲ 〈團吉安特支報告——組織民校談話會、紀念活動及工人運動等情況〉(1925年5月11日)、〈團吉安特支報告——對於同志和察看人的要求，延生在吉安的工作情況〉(1925年9月23日)，載《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3-1926)》，頁148、214。
- ⑤⑰⑱ 〈團成都地委向團中央的報告——關於團地委的成立情況〉(1922年10月23日)，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41。
- ⑤⑱ 參見〈團重慶地委給團中央的報告——關於執委會的改選〉(1924年2月23日)、〈團重慶地委給團中央的信——報告工作近況〉(1924年3月7日)，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152、162；任吾祖：〈披荊斬棘的猛士——童庸生傳略〉，載中共重慶市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重慶黨史人物》，第一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頁91-119；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第一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頁571-72。
- ⑤⑳㉑ 〈童庸生給團中央的信〉(1923年11月4日)，載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四川楊闇公基金會編：《中國YC團(中國青年共產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7)，頁90；91；90。
- ⑤㉒ 惲代英：〈靠自己與為自己〉(1924年10月12日)，載《惲代英全集》，第六卷，頁521。
- ⑤㉓ 〈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頁354。
- ⑤㉔ 〈青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2年12月4日-16日)，載《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頁387。
- ⑤㉕ 〈中央政治報告〉(1926年9月)，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二冊，頁172。
- ⑤㉖ 〈李竹聲給團中央的信——安慶團的暑假工作及全體團員大會情況〉(1925年9月20日)，載《安徽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一冊1922-1927)》，頁35。
- ⑤㉗ 〈童庸生給團中央的信——報告團重慶地委宣傳部工作情形〉(1924年8月1日)，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183。
- ⑤㉘⑤㉙ 〈中共重慶黨、團地方執行委員會為消除楊洵、童庸生誤會召開的批評會記錄〉(1926年4月15日)，《黨的文獻》，2017年第2期，頁42。
- ⑤㉚ 〈團安慶地委工作計劃〉(1925年12月中旬)，載《安徽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一冊1922-1927)》，頁54。類似的還有四川涪陵社會主義青年團，參見〈團

- 涪陵支部給團中央的報告(第十一號)——二、三月份工作(1925年4月28日),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261。
- ⑦① 代英:〈學生運動〉,頁10。
- ⑦② 代英:〈這樣做一個宣傳家(上)〉,《中國青年》,第4卷第84期(1925年7月25日),頁503。
- ⑦③ 〈團南昌地委給團中央的報告(第二號)——過去一個月的工作情形〉(1925年11月),載《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3-1926)》,頁237。
- ⑦④ 〈團安慶地委宣傳部五月份報告——宣傳工作和各類刊物狀況〉(1926年6月4日),載《安徽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一冊1922-1927)》,頁102。
- ⑦⑤ 〈團九江地委易虛給團中央的報告(第九號)——關於五月十八日全體團員大會情形及決議事項〉(1924年5月19日),載《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3-1926)》,頁83-84。
- ⑦⑥ 但一:〈怎樣使學問與口才雙方進步〉,《中國青年》,第3卷第72期(1925年3月28日),頁340。
- ⑦⑦ 〈團上海地方工作的總現象〉(1926年7月),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頁265、212。
- ⑦⑧ 〈楊闇公致團中央的信(第十七號)——渝地組織情況〉(1925年4月19日),載《四川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群團文件1922-1925)》,頁246。
- ⑦⑨ 陽翰笙:《陽翰笙選集》,第五卷(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頁57。
- ⑦⑩ 牛瑞祥、黃琪奧:〈革命星火 在巴渝大地點燃〉(2018年7月5日),《重慶日報》網, http://zt.cqrb.cn/content/2018-07/05/content_158958.htm。
- ⑦⑪ 早期留蘇青年雖然在國共合作後被陸續派回國擔任中共領導職務,但如長沙青年團毛澤東、南昌青年團方志敏、廣州青年團阮嘯仙等地方「五四」革命者在中共早期發展中能夠脫穎而出,並在土地革命時期充任中共黨內重要領導職務。
- ⑦⑫ 轉引自康乃爾:《男性氣質》,頁13。
- ⑦⑬ 惲代英:〈革命與黨〉(1923年12月20日—1924年1月20日),載《惲代英全集》,第五卷,頁310。
- ⑦⑭ 〈團上海地方各部委工作概況〉,頁340;〈團徐州地委關於經費及委員情況的報告〉(1925年9月27日),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1926)》,頁216。
- ⑦⑮ 〈團上海地委會議記錄——研究存在問題及幹部鑒定〉(1925年),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青年團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頁165。
- ⑦⑯ 〈湘區報告——黨的組織狀況,在國民黨中工作及政策,勞動運動及工人、農民、國民運動、教育宣傳工作計劃〉(1924年5月),載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省委文件1923-1926)》(內部發行,1983),頁6。
- ⑦⑰ 〈團南京地委關於中央十二號通告的幾點意見給團中央的信〉(1923年12月17日),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1926)》,頁10。
- ⑦⑱ 〈團徐州地委一月半來工作情況報告〉(1926年1月16日),載《上海革命歷史文件彙集(團江蘇各地委、特支、獨支1923-1926)》,頁240。
- ⑦⑲ 〈團南昌地委組織部關於工作計劃的報告〉(1925年11月),載《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彙集(1923-1926)》,頁242。
- ⑦⑳ 閻雲翔著,龔小夏譯:《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25。
- ⑦㉑ 沈霞:《延安四年》(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42、121。
- ⑦㉒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著,李君如等譯:《歷史與意志:毛澤東思想的哲學透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頁2。